扬帆远航正其时

——专访云冈研究院党委书记张焯(二)

本报记者 冯 桢 梁有福 实习记者 赵小霞

记者：这几年，云冈的数字化技术在文物保护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未来将有什么新打算？另外，窟檐保护工作会继续进行吗？

张焯：去年，云冈的数字化技术运用得到进一步发展，云冈的机房也建立起来了。机房的设备和软件设计都是全国一流的。下一步我们会围绕把云冈石质文物保护作为全国区域性中心这个定位，把所有的文物配套资源都挖掘出来，努力进入全国第一方队。

在洞窟保护工作中，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窟檐问题。窟檐是保护洞窟的传统做法，而且是经过历史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保护方法。云冈走过一千五百多年的岁月到了今天，弥足珍贵，我觉得一切保护措施，只要能用的都应该用，不要有思想“禁地”。如果完全封闭不行，担心把云冈的历史形象、在人们心目中的外观形象改变了，给石窟戴个帽子或者打把雨伞，这可以吧。我们决不会固步自封，一定要把云冈保护工作做大做强，做成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标杆。

记者：云冈研究院这次升格对云冈的保护研究有什么意义？

张焯：这是云冈的第二次升格，第一次升格是上世纪90年代。那次升格对云冈石窟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起到巨大作用。这次升格，标志着云冈新的发展时期的到来。我们过去叫云冈石窟研究院，这次升格叫云冈研究院，取掉“石窟”二字，意味着云冈的概念扩大了。云冈石窟研究院的保护研究区域基本限定在石窟区一公里范围内，改为云冈研究院后，地理和学术范围就更大了，可以说云冈的受重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名称的改变和云冈的发展是一致的。现在全社会都在支持我们，很多大学都参与进来，和我们共同去攻关、共同创新发展，我们自然会信心倍增。我们坚信，这次升格会让云冈保护和研究走上更光明的道路，迈上更大的台阶。

记者：云冈学术研究成果可以实现共享吗？云冈研究院未来的发展方向和目标是什么？

张焯：云冈是世界级的艺术宝库，我们通过《云冈石窟全集》没有遗漏地把它的形象全部交给了广大受众，而云冈考古报告也将把多年来云冈考古发掘成果全面完整地向世人公布。山顶考古报告已经送到文物出版社了，今年将出版；窟前考古报告初稿也已基本形成，争取明年出版。未来，研究者在我们这两个考古报告的基础上研究云冈，与云冈考古有关的95%以上的内容就都有了。我们不是关起门来自己去研究，而是搭建一个平台，把研究成果向世人发布，实现资源共享，只有让大家都能看到才更有意义。

和敦煌比，云冈研究还存在差距，这是历史形成的。首先，云冈是皇家工程，最初是不允许民间染指的。北魏迁都洛阳后，民间可以在云冈开凿了，也是少量的。文字记载也不像敦煌、龙门，有大量的题记。北魏王朝留下过修建云冈的大碑，但没能保存下来，使得云冈的文字资料特别少。其次，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就有一批艺术家、专家学者去敦煌工作。第三，由于敦煌藏经洞的许多古籍流失海外，全国人民都关心敦煌、支持敦煌。云冈现在也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云冈学要走开放式的、毫无保留的、接纳全世界学者参与的研究道路，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发展方向。云冈研究院的未来，应该是国际性的、世界级的文化艺术研究保护中心，从现在开始就应该朝着这个目标前进。

记者：建成国际性的研究保护机构的关键是什么？

张焯：云冈研究院能不能成为世界级的研究保护机构，人才是关键。十年前，云冈的研究人员只有20多个人，通过梯队式的人才积累，这几年每年都有硕士研究生充实进来，博士生也有好几位了。目前我们的研究队伍正在逐渐扩大和完善，现在已经有七八十名研究人员，再过几年会更多。我们的人才观是，不求为我所有，但求为我所用。

同时，我们一直秉持开放的胸怀，吸引全国一流的大专院校、科研单位与我们合作。现在与我们合作的有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建筑大学、青岛海洋大学等；全国八大美院的学生几乎每年都来云冈观摩写生；敦煌研究院、西安文保中心，都与我们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在共同进行科研项目的研究、保护项目的合作过程中，也锻炼培养了云冈的人才队伍。随着云冈的知名度越来越大，云冈的历史地位、艺术学术价值逐渐会得到更广泛的认可。可以预见，将来与我们合作的单位会更多，合作会更紧密，形成更大的合力。现在云冈研究院的形势非常好，已经呈现出良性循环的发展态势。

记者：云冈研究院会继续挖掘云冈十寺遗址吗？景区内遗址保护情况如何？考古工作下一步会像敦煌一样向外延展吗？

张焯：从我们的主观愿望上讲，也很希望把云冈的十个石窟寺都挖掘出来，让它们早日呈现在世人面前。通过与国家文物局的沟通，我们达成共识：不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剩余寺院遗址挖掘工作留给后来人。这是对历史负责，是对子孙负责。从历史发展角度看，我们的考古工作越往后会做得越好。解放初期和改革开放初期挖的那些遗址、古墓葬有不少是粗放式的，有的墓葬壁画也被回填了，放在今天是绝不可以的，那是宝贝。假设今天再挖掘一个北魏寺院，我们绝对会比以前更仔细地操作，带着问题去挖掘，考古层次也会更高。所以有些事情往后放一放会更好。

现在考古界有个问题，城市在不断发展扩张，许多建设工程都在进行，时有文物遗迹被发现，但挖得快了，考古报告跟不上。许多参与挖掘工作的考古工作者途中退休，没有形成考古报告，一些珍贵的历史信息就消失了，这是个大问题。作为省人大代表，我曾就此提交过一个方案。

云冈堡直到明朝中后期才出现相关记载，过去对它的始建年代一直不清楚，现在通过研究也逐渐理清了。我们还在景区里对古堡进行了修复，埋在地下的无法修复的几段堡墙，我们也在遗址上修了路立了碑。另外，20窟崩塌的西立佛重立项目也审批下来了，今年将把它安放在20窟对面建筑群的大殿里。

在云冈研究院这次设置的10个部门里，有个云冈考古所，目的就是要加强云冈的基础研究工作，通过考古去挖掘云冈的历史、北魏的历史。云冈考古下一步不能只是独善其身，还要兼济众生，参与大同市、山西省以及全国的考古挖掘和研究工作。

记者：您前面提到《云冈装饰纹样全集》的编辑工作现在已经启动了吗？与云冈有关诗词书画收集整理情况进展如何？

张焯：十卷本《云冈装饰纹样全集》编辑工作已经启动，它是云冈研究院、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和青岛出版社三家单位合作实施的。中国文联副主席、山东美院院长潘鲁生和我们的想法一样，要把这部全集做成争气工程。最近我们正准备邀请各方专家开个初评会，努力把这部全集打造成具有权威性的精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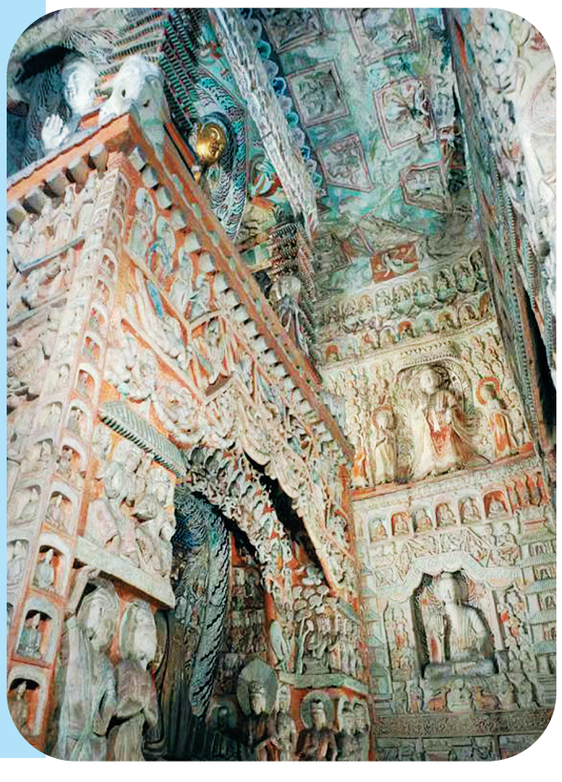
历代文人墨客吟咏题写云冈的诗词文章虽然有，但比较少。目前，云冈研究院已经收集了一些历史文化名人写云冈的诗词。表现云冈的古代画作截至目前还没有发现。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我们曾邀请专业画家入住云冈，创作了一批云冈题材的画作。我们还邀请名家看云冈、写云冈、画云冈，拍云冈，举办相关书画摄影展，为后人留下我们这个时代记录下的云冈。法国前总统乔治·蓬皮杜的儿子阿兰·蓬皮杜来云冈参观的时候，我们专门安排他到云冈美术馆油画展厅观赏他父亲参观云冈的巨幅油画，让他倍感亲切和欣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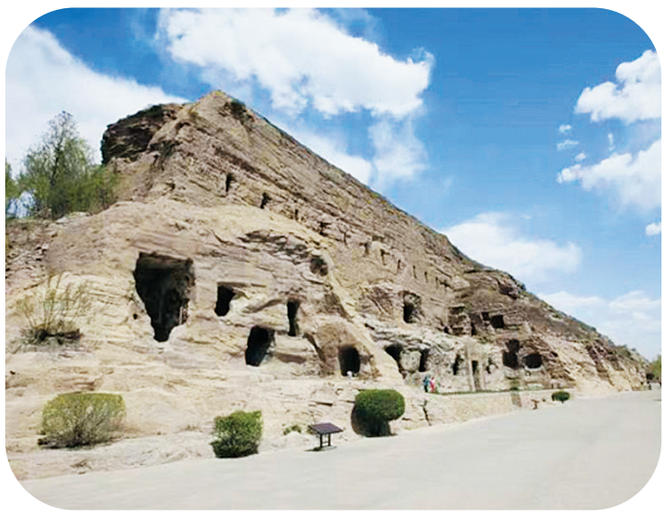
我们还曾想让云冈的美工人员重现北魏或辽金时期的云冈石窟，但苦于缺少资料，很难实施。数字化给我们找到了出路。经历了1500多年的云冈已经残破，北魏时期刚开凿出来的云冈一定是完整的。我要求数字中心不能满足于当前洞窟的原样复制，还要通过研究，把北魏、辽金时期的云冈重现出来，争取让人们看到不同历史时期的云冈。

记者：目前云冈保护和研究的总体进展情况如何？

张焯：云冈研究院正在全力推动云冈的研究、保护和云冈学的创建工作。在我们给国家文物局上报的系列项目中，主体是云冈的保护，包括云冈的窟檐、山顶的寺院遗址展示，云冈堡的展示保护，以及云冈的危岩体加固、排水，云冈彩塑壁画的保护等等。在研究和数字化保护方面，也设立了项目，还有场馆改造提升，总共20个项目，正在具体落实。在工程性项目之外，我们在文物保护、研究和云冈学研究方面，向省科技厅和省文物局上报了12个项目，加起来有32个项目。这是多年来云冈保护和研究第一次“爆发式发展”的一个项目清单。另外，没有上这个清单的小项目，几乎每个研究人员手里都有，清单内外总共有70多个项目正在同时推进。

云冈大发展的时代来临了，扬帆远航正其时。我们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一定要把云冈做到中国最好、世界最好，让这座千年艺术宝库绽放出更加璀璨夺目的光彩，不辜负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和全市人民的厚望。





踏遍青山方识君

——原云冈石窟研究院大同忻州吕梁石窟寺专项调查记(三)

如对待生命一样去调查石窟
——忻州调查组纪实

忻州市位于山西省北中部，黄土高原东端，东部群山环抱，西部丘陵起伏，沟壑纵横，全市面积为25157.641平方千米，是山西省面积最大的市，也是石窟寺数量较多的市之一。忻州调查组共有6名队员，小组队员历经近两个月时间完成了33处石窟调查任务。

一、大雪封山，旗开得胜

陀罗山石窟是忻州调查组抵达的第一处石窟寺，原本可以乘车抵达山脚，但是由于刚刚下过雪，原本只需爬30分钟的山路，调查队员硬是爬了2个多小时。队伍中57岁的金永新膝盖有旧伤，他不愿意因自己的特殊情况耽误小组的调查进度，一直忍着疼痛登到山顶。到了山顶已近1点，饥肠辘辘的队员们草草吃了点随身携带的干粮，便立即投入到调查工作中。小组队员按照既定的流程，相互配合，各有分工，最终圆满完成了陀罗山石窟的调查任务，队员们脸上露出了微笑，踏着余晖，回到了车上，才渐渐感受到了疲惫。

忻州调查组队长范潇自2020年4月开始的大同市石窟寺预调查时就担任组长，当时他妻子刚刚怀了二胎，到2021年1月底基本上一半时间在野外，这段时间他妻子既要安心养胎，又要照顾不满2岁的儿子。他说，这段时间亏欠了家里太多，还好有父母帮忙照料，自己才能安心工作。等到他结束调查回到家时，妻子离预产期仅剩4天。

二、佛国圣境，无惧严寒

五台山是佛教寺院艺术的精华所在，忻州调查组调查的摩崖造像正是隐藏在这佛国圣境中。五台山海拔较高，有着特有的冬季气候，队员们顶着零下25度的气温，在丛林里寻找一处又一处造像，记录用的中性笔也被冻住，需要不断向笔头哈气才能继续书写。五台山的旅店多是自建房，回到驻地也不暖和，队员们夜里只能披着羽绒服，完成当天的内业整理任务。

三、披荆斩棘，彼此搀扶

青龙山脚下是新堡河与黄道川公路，天花洞石窟就位于青龙山半山腰，这里由于多年前佛像被盗凿破坏，当地人已鲜有人来，道路早已荒废，队员们只能自己寻找上山的路。程鹏患有恐高症，上山时腿一度抖得无法活动，好在范潇和孟令松都有多年野外工作经验，通过判断地形，仔细观察，一个在前面开路，一个殿后，队员们在只有羊能通过的道路上彼此搀扶，终于到达了天花洞。比起队员赶路时的关山阻隔，被“锁”在深山里的“天花洞”，更像是被遗忘的文物宝藏，洞窟虽曾遭人盗窃，而仅存的雕刻依旧值得精研细思。

忻州调查组队员、地质专家金永新今年已57岁，参与了忻州组前期的调查工作，翻越了一座又一座高山，还经常带头走在最前面。他的膝盖有旧伤，现在还有少量积液，山路陡峭时膝盖疼痛难忍，回来要休息很久才能缓解。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参加后半段的调查工作，让他很是失落。

四、历经艰险，苦尽甘来

每一处石窟寺所在位置大多在深山老林之中，人迹罕至且周边没有餐馆，队员们下山之后，只能在车上用泡面裹腹，有时回到车上，暖壶里的水已经不再滚烫，即便如此，登山越岭后的队员依旧对仅有的泡面感觉温暖。

忻州调查组队员孟令松来自东北，是云冈忻州调查组的一名外援，但是他并没有把自己当做山西石窟调查的局外人，他比同组人年龄稍长，是队伍里的大哥，善于野外工作，很有经验。每次遇到比较难上的石窟，他总是第一个冲上去，确保大家都能上下才放心，需要扛重东西比如梯子的时候，他总是揽在自己肩上，让别的队员可以专注于自己脚下的路。

截至2021年1月31日，除去1处石窟寺因大雪封山无法调查外，忻州调查组用了近2个月时间，共计完成了33处石窟寺全部外业调查，圆满完成任务。

于寒冬腊月小年之时，原云冈石窟研究院石窟调查组历经两个多月时间，共完成106处石窟的田野调查，此次调查，收获颇丰，不仅为全国石窟寺的调查工作贡献了力量，更为下一步的文物保护、研究、规划、利用工作提供了一份可靠、详实的材料，为我国石窟寺文物的保护与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完)

总稿：闫宏彬、王家鑫

执笔：康敬亭、解华、范晓东、李敏、范潇、王家鑫

本报地址：御东行政中心 21、22 层 | 邮编：037010 | 本报发行公司发行 |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1402004000009 | 开印时间：1 时 印完5时10分
联系电话：办公室 6034132 要闻部 2043974 广告热线：2023122 发行热线：2503915 承印：大同日报传媒集团印务公司 电话：2429838